



再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

z

作者：曾成贵 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曾成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

当代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为此，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和理论界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对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定义，目前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界定是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以集体智慧结晶视之；一种界定则把它定位于毛泽东个人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主张的总和。笔者认为，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建党思想，定义于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为好。因此，本文所论及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一般不涉及领导集体。1991年，笔者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书，对这一主题已有初步探讨，2003年，又发表《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论纲》，然而深感意犹未尽，故作此“再论”。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马恩时代，共产党没有执政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并没有系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论及执政党，是从列宁开始的。他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第一次成为执政的党。革命胜利后不到7年，列宁就去世了。这期间，苏联处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尚未全面展开。因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也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和深入。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最杰出的代表者。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指导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党长期在农村活动的条件下，通过加强思想建设，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样一条建党新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将实现伟大转变的时刻，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在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7年中，毛泽东更始终没有放松对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 提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还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

p. 1098) 1954年9月25日, 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2—p. 554) 当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 社会上出现怀疑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 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 毛泽东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并针锋相对地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3—p. 303) 以后, 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么动乱的情况下, 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保持和加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的决心和信心。

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说的基本主张。共产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二者密切联系, 不可分割。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首先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民主革命才取得的胜利; 它也是现实的必然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此其一; 其二,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共产党能够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 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 其三,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还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共产党有这个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 能够团结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正因为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第二, 提出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就充分估计了党执政以后将面临的新挑战, 提出执政党建设必须坚持“两个务必”, 必须拒腐防变。他指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 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 1438\1439) 他强调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 预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1960年代, 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党实施“和平演变”。

“两个务必”的核心, 是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所在。党执政以后, 社会地位变化了, 中心任务变化了, 工作环境变化了, 生活环境也变化了。这些变化都是新挑战。最大的危险, 莫过于脱离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关键是要掌好权、用好权。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就能够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明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是各革命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与共产党一道共同奋斗得来的,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领导人民群众长期执政, 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是更加艰巨的任务。继续保持艰苦奋斗, 就能够在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政治本色, 立足国情, 夙兴夜寐, 发愤图强, 就有可能抵御住糖衣炮弹的袭击。真正坚持了“两个务必”, 官僚主义就不会有用武之地, 腐败分子也难觅藏身之机。在长期执政中解决腐败的历史难题, 共产党就可以跳出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率, 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 提出必须发扬党内民主,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共八大认真研究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提出要根据执政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贯彻集体领导原则, 扩大党内民主。八大以后, 毛泽东提出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稍后, 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指出“我们的目标, 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较易于克服困难, 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 党和国家较为巩固, 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 543) 1962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再一次专门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出: “没有民主, 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 “没有民主, 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 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 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没有民主集中制,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5—p. 293~297)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执政的政治目标。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执政党，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表率 and 核心作用，有利于达到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发扬党内民主，通过必要的程序形成决策，不是把决策权、指挥权都集中在“一把手”身上，这就会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四， 提出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干部建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1956年，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风波时，毛泽东就讲过干部队伍对于巩固和发展事业的重要性。196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自己有错误，要做自我批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共产党，也关键在人，在于党的干部和接班人。所谓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高素质的干部，应该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同时又应该是懂业务、会管理的。不论职位高低，都应该做人民的勤务员，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绝不能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有了这样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才会后继有人，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也才能正确地落到实处。

第五， 提出必须加强思想建设，学习理论，破除主观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他针对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的情况，提出要读马列主义的书籍，注意研究方法，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直到1974年、1975年，仍一再提倡“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6—P. 413\426)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作为党一贯的思想原则，倡导到基层、到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查研究，破除主观主义。他认为“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当前“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3—p. 90)他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指出必须创造新的理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5—P. 109)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和模式出发，这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发展了的实际，提出新的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样，党就不会落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坑，从而达到永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第六， 提出必须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

增强党的团结，也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在中共八大的第一次预备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就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他指出：为了建设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以便在人民中更好地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还要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党的团结，必须正确处理党内关系，要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必须坚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在党内搞宗派主义。

团结就是力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都联系着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任何时候，都必须高举团结的大旗，有了党的团结，才会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以上是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几个主要的方面，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执政党的建设思想。这几个方面，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建党思想体系直接发展而来，结合了执政的新实践，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指导了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7)。毛泽东还有一些极富远见的思想，比如提出应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又比如主张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则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理论上没有展开，在实践上也未能坚持下去。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历史性局限

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还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科学的解决。如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结合了执政的新实践，但主要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建党思想体系直接发展而来。这其中，反映了党的建设内在规律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会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但是，立足新实际，解决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理论，又以新的理论指导党建实践，则更为重要。毛泽东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在这方面存在着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是时代和实践造成的，故笔者认为它是“历史性局限”。

第一，没有根据执政的实际科学地树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

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总体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应当说，按照领导核心来建设党，就是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建设党的总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会不会发生变化，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需要严肃对待认真回答的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8—p. 426)这段话在“领导”与“阶级”之间增加了“无产”二字以后，被作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写进了九大党章。“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成为当时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指导方针。

由于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地位变化了，任务变化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必然也应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必须赋予它们以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党建总目标的确立，必须全面反映这些变化，必须与时俱进。在革命时期，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建设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进入执政时期，党的主要任务已经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应当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样，党就应当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建总目标，必须体现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所谓“五十字建党纲领”，显然停留在革命党的阶段，把党仅仅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体现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虽然也要求把党建设成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没有根据执政的实际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建国以后，毛泽东虽然不时强调实事求是，号召党的各级干部加强调查研究，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越来越多，在实践上越来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不很清楚。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的经验，他把抓阶级斗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抓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发展到在共产党内抓资产阶级，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当今中国，存在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东西，“跟旧社会差不多”。(6—p. 486)

强调实事求是怎么在实践中会走向反面了呢？这说明其一，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在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一旦确立以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二，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要有制度保证。以制度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得到贯彻，使之不以个人的愿望和决定而改变；其三，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坚持，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看是否能够与时俱进，是否能够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

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果，执政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的创伤。

第三， 没有根据执政的实际将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化。

关于党内民主，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新中国时期，毛泽东同样重视党的民主建设。他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5--p. 307）在总结分析斯大林错误的时候，毛泽东注意到了苏共的制度缺失和缺陷，提出中国党也“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3--p. 19）

但是，在实践上，中国党同样处在制度缺失和制度缺陷的状况。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9--p. 333）就党内民主来说，实体性民主和程序性民主，二者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都需要制度加以保证。在毛泽东看来，发扬民主总是与加强集中相联系的，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以集中为民主的前提和目的。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3--p. 208\209）民主作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服务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它是手段。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本身也是一个独立成分，人们不仅要有经济生活的富足，还有政治生活的民主，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就决不只是手段，同样是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有物质文明，同时也要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果只把民主作为手段，那么手段是可以选择的，当认为有了比它更好的手段时就必然会轻视它甚至放弃它。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改进，但是，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结果还是使党的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

第四， 在领袖个人与领导集体的关系上没有破除迷信。

毛泽东倡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主动防止脱离人民群众，防止产生官僚主义。他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与马恩列斯并列，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不同意塑造自己的铜像，不同意为自己在家乡修建房屋、道路等等。但到后来，他逐渐接受或者推动个人崇拜。1958年，针对社会上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现象，他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3--p. 369）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盛行的对他个人的崇拜，毛泽东明确表示“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6--p. 174）

个人崇拜是党内民主的腐蚀剂，个人崇拜兴，党内民主消；党内民主消，个人专断盛（10--p. 303~306）。当然，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历史原因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有过分析，指出其原因，是由于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党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存留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未能制度化、法律化，法律也未能取得应有的权威。这些分析，都是十分中肯的。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源泉

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p. 109）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正是毛泽东所期盼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自然就包括着对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科学思想的继承。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宏富而精辟的论述，包含了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科学论断的引证和阐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见解，往往成为江泽民论析当前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理论支点。本文所述述的六大方面：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关于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必须拒腐防变；关于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必须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关于必须加强思想建设，学习理论，破除主观主义；关于必须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等等，江泽民在《论“三个代表”》和《论党的建设》中，都有继承和进一步的阐发。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源泉，这本身就体现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它对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深远影响。当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主要是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方面的，而且以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化为宏观背景，以党的建设的实践和现状为现实依据，并不只是对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简单运用。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与继承，更有创新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克服了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中的几大历史性局限。毛泽东未能根据执政的实际，科学地树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地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1)把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与“三个代表”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未能根据执政的实际，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旗帜鲜明地倡导“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并且以是否坚持“与时俱进”来审视党的一切工作，坚持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毛泽东未能根据执政的实际，将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处于状况最好的时期，制度化的步伐迈得最快最大。此外，关于党的先进性的论述，关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论述，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的论述，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论述，关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论述，关于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论述，等等，都是思想深邃、意义深远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这些论述，当然首先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江泽民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结果，不仅充分考虑到党已经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而且充分考虑到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局限，党的建设所走过的弯路，也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聪明的政治家总是善于向历史学习。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所有过的局限性，又未尝不具有历史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曾成贵.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论纲[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3）.
- 8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曾成贵.中共党史论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转载请刊出本网站名

相关文章

- ▶ 武汉商界在五四运动中的角色表现再探
- ▶ 毛泽东治国方略论纲
- ▶ 毛泽东执政党的建设思想论纲
- ▶ 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

您是第279095位访客: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版权所有 2003: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技术支持: 千年科技